

加加美光行教授訪談¹

時間：2009/5/18

地點：日本名古屋，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研究所

訪談、整理、校正：陳綺齡（台灣大學政治系碩士）、邵軒磊（台灣大學政治系博士後研究員）

問：先請問您幼時成長經歷、在學校的求學過程

答：我是家中排行 12 是最小的孩子，出生的時候家裡很窮，因為正好是戰敗前一年出生。原本父親開工廠，但是工人都去當兵了，所以工廠倒閉了。至三歲以前差點餓死了三次，母親也沒有母乳，所以他營養不良，長得不高，體重也很輕，至國中以前還有雞胸（呼吸相關器官發育不良）²，還因此以為無法談戀愛了。三歲時成為一對年輕夫妻的養子，搬到九州生活，五歲時由於養母染肺結核，所以又回到親生父母親身邊，但三歲到五歲間的生活都記得很清楚，不久後養父母都因肺結核去世了。

大學三年級時唸了一本書，關於「低度開發」的概念的書，因此決定要研究亞非拉的低開發國家的依附性。大學畢業的論文是寫關於亞拉非第三世界國家低開發的依附性。當時的指導老師是富永健一（第一個介紹 Talcott Parsons 的經濟社會理論的學者）。我在東大上社會學課時，常常挑戰老師；所以富永老師請經濟史學者大塚久雄來評，他說我寫得非常好。1967 年進入亞細亞經濟研究所，專門研究第三世界國家，是富永老師推薦我進去的。所長面試時問我要研究什麼，我說：印度的社會學，所長說印度的研究人很多，就跟他說中國很有價值，所以就研究中國。

問：為什麼想研究印度？

因為對傳統文化和宗教很感興趣，印度包括了佛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這些傳統對印度的經濟和文化是具有正面或負面影響，這是我所關心的。

¹ 原文出處為：陳綺齡、邵軒磊，『加加美光行的中國認識及其學思歷程』（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出版中心，2011），方便研究者引用原出處使用。

² 雞胸是一種疾病，一般認為與漏斗胸畸形一樣與遺傳有關，多數人認為是肋骨和肋軟骨過度生長造成的，胸骨的畸形是繼發於肋骨畸形的。影響呼吸循環的胸壁畸形，如漏斗胸、雞胸、胸肌裂等，症狀對呼吸和循環功能的損害可透過手術糾正。

問：關於研究經歷

1967年3月大學畢業，1967年4月進入亞細亞經濟研究所，當時正逢文革發生，就研究文革。當時亞經所有六個親毛派，加上我就是七個，現在都是現代中國學會的成員。文革時，現代中國學會屬親毛派，亞洲政經學會屬反毛或中立派。

問：為何當時自認是親毛派？

我當時非常同情中國，因為日本1960年代的公害、藥害和教育的問題，是高速現代化的結果，日本國內的開發主義的結果。

發展是自動的，以自己為主體；但開發是他動的，自己不一定是主體，可能是他者，自己成為目的語。以政府為主體，開發計畫執行，則當地居民則成為被動的主體。例如：長江三峽的計畫，政府 V.S. 住民，因為日本1960年代也發生有很多被動的發展，如：日本政府 V.S. 成田機場的住民，所以非常同情中國的情形。第三世界變成了開發的他動，所以有了依附性，這是加加美想要研究的。1960-62 美國在 UN 推行第三世界開發主義計畫。依附性是第三世界國家並非為開發的主體，而且受到1960-62年 UN 第三世界開發計畫的援助，使得他們的開發有了依附性。當時中國的土法煉鋼，不用洋法，不跟美國走，我趕到很羨慕、崇拜，看到日本1960年代的公害，是嚴厲地批評。當時便參加現代中國學會，而是亞洲政經學會（不知道為何他們會反華）。

問：為何認為亞經所比較中立？

1960年代，岸信介（反共派）要東畑成立亞經所，但東畑說不要成為國策取向的研究所，要以培養人材為主，不是實用主義，重視基礎研究，亞經所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直接派人到當地學語言，和上大學。亞經所考試很重視英文，之後要學第二外國語。

在亞經所裡面，有一位前輩，大加加美七歲，一開始我向他請教問題，但對方說我們都是領薪水的，是競爭的關係，你怎麼問我？你已經是研究員了，我們不是師生關係。當時我的壓力很大，因為有領薪水，要寫 paper。而在午飯的 salon chat 時候，每個領域的人都是平等的，沒有上下關係。而每週一次的研究會也可以批評前輩，我也被批判過很多，但我都很樂於接受。

問：為何對第三世界國家很感興趣？

對第三世界國家很感興趣的原因在於能體會那種貧窮的感覺，自己有過那樣的經驗，所以特別對第三世界國家有感情。1984年曾到過台灣，應中國時報記者邀請來看看台灣的民主化運動，當時黨外人士邀請加加美去參加他們的會議，有謝長廷、陳水扁、陳永興、康寧祥，對陳永興印象非常深刻，因為陳永興曾說「日本人來參加沒有用」。但加加美覺得很有趣。

問：影響您最大的人物是誰？

最尊敬的老師是板垣與一（亞洲政經學會的創辦人之一）。我第一本唸得關於第三世界問題的書就是板垣的書，以及他的研究方法。板垣研究印尼，自己進入印尼，參加印尼的民族運動，草根運動，很有愛情和熱情。板垣親身參與印尼的民族運動，具有主體性。板垣的研究用了一位荷蘭的社會學家 J. H. Boeke 的概念，複合社會的概念就是英國在印尼採分隔統治殖民地，例如種族問題（華僑 V. S. 印尼），利用種族的矛盾來有利於統治。板垣就詳細的說明印尼的複合社會，並舉很多例子，很有說服力。但我不懂他為什麼反華。亞經所第一任所長是東畑精一（東大教授）。

問：請說說1970年在香港留學一年期間的經驗和開始文革研究

26歲的時候，研究所派我到香港學漢語，我的漢語在香港大學從26歲開始學的，可是1970年到71年在香港待了一年，71年9月發生林彪事件。我在香港讀了半年漢語，這時認識了一位50多歲香港大公報的記者，他很喜歡我，他說每週三都要跟他飲茶，所以我們每個禮拜就一邊飲茶一邊聊天。

他主要關心的是日本國內的平民運動（反美安保運動），因為我自己沒有什麼派系，但是因為激情而參加安保運動。雖然已經進了研究所，還是經常參加反美安保活動，所以對當時日本的平民運動十分熟悉。在1970-71年在香港發生了保釣運動，打倒日本軍國主義的運動，大公報記者和其他香港大學的積極份子都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實際情況很感興趣，所以都想問我。我自己認為，雖然我參加反美安保運動，但中國青年所批評的日本軍國主義和現實的實際的日本反動派的不一樣，所以我希望給對他們說：日本自民黨的親美派，要放棄日本的和平憲法，再軍備的想法，然後給他們看東京國際機場農民反政府運動的影片。以這種方式召開討論會，主題是關於日本反動派的實際情況。對此，大公報的記者很感興趣，

1971年6月開始一直到9月份持續的見面，但9月份他突然失蹤了，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每週三一次的見面，他突然不來了，我打電話到他辦公室，接電話的人說沒有這個人。我覺得生氣，跟他說我再三的在你們在大公報會議室跟他會面，你怎麼說沒有這個人，但他不管怎樣還是說沒有這個人，原本他8月的時候跟我說，10月1日的國慶日我們大公報一定要請你來參加國慶節的慶祝活動，我覺得很高興，但因為他失蹤了，我覺得很失望，到了11月下旬，他突然打電話給我，他要跟我開開心心吃飲茶，所以見面我就直接問他你到哪去了，他回答說他去北京了，我問去北京做什麼，他就不敢說了。

我猜是他一定為了林彪事件北京參加研討會，所以我好像是日本研究中國問題學者中是第一個知道林彪事件是真正發生的事情。在香港的日本方面的好多報館的記者都要採訪我，他們說：「你有一個大公報記者朋友，會知道事情的真相吧？」我就說：「**這個事情是真實發生的事情。**」有很多日本的學者不相信我，他們說我被香港的謠言欺騙了，但最後我是對的。但另一方面，我對毛澤東開始失望了，毛怎麼會殺死林彪，我當時不能理解，所以開始研究文化大革命。

問：當初您怎麼開始研究的？

1971年在香港專門研究當代中國的研究機構有兩個，一為大學服務中心，另一為友聯研究所，那邊的知識網和資料庫有好多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資料，我開始看文革資料，特別是紅衛兵小報，漸漸知道文化大革命的真相。就在這時我發病了，腎病，有血尿，香港的醫生勸我回日本看醫生，所以1971年12月25日，回到日本住院一個多月養病，出院後馬上再開始研究文化大革命。亞經所替我買美國 Hoover Institute 出的資料「紅衛兵小報」，價格很貴約100萬（日幣），當時我自己的工資是6萬多。很貴，但研究所替我買了，所以我拼命地天天地看紅衛兵小報，裡面有紅衛兵各派系的武鬥，並且發現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作者沒有名字，只有筆名，篇名是「出身論」，我看了這個論文後，受到很大衝擊，所謂出身論、血統論。1975年時研究文化大革命已經六年多，這時在一些雜誌上發表看法、分析，說的是在文革中可能幾十萬個人犧牲了，並且這雜誌是新左派雜誌，當時1975年文革的真相還沒有被暴露，所以很多新左派還是很同情，還有人支持文化大革命，可是我在他們的雜誌上發表論文說，在文革期間有好幾十萬人被殺。（問：哪個雜誌呢？答：看情況）。

有很多人訪問我，問說你的立場好像有很大的轉變，現在你的立場是反華反

共反毛的反文革的，我回答說我不是反文革，我承認文革歷史上的意義，但文革還是有黑暗面，這個你要承認，可是他們不聽我的。還有另一個，1972年，在**中國研究旬報**，中國研究所機關的雜誌，我發表了保釣運動的文章，我說保釣運動主要的戰場、舞台不是在中國大陸，而是在香港和台灣，並且保釣運動裡面產生了一個民主運動。香港過去從來沒有民主化運動，但發生了保釣運動以後，在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裡面產生了民主化運動，我的說法是一種保釣的反日民族運動跟香港的民主化運動有一種聯動性。親毛派和親文革派的學術界和學生運動的積極份子對我的這篇論文有很大的反感，直接跟中國研究所的編輯部抗議，說你們編輯部怎樣接這樣反動的文章，反動的部分在於因為保釣運動的主要舞台是中國大陸，毛澤東和文革派就是保釣運動的主力軍，親毛派和親文革派日本的左派都主張這樣，我自己當時70、71年代一年待在香港，自己親身體會到、親身參加學生的保釣運動，雖然我是日本人。（問：日本的親毛派新左派支持保釣運動嗎？答：雖然支持，但是是支持中國共產黨為主、帶領的，香港和台灣的保釣運動是旁流的，非主流的。而我自己是參與過香港學生的保釣運動，參與過報紙宣傳等很多活動。）香港人是一種賣國賊，叛徒跑到香港來，台灣是反動的，他們認為沒有真正愛國精神的香港人和很反動的台灣怎麼能夠主動的舉高保釣運動這種愛國運動，他們不相信。

所以他們圍攻我，有一次他們向中國研究所編輯部要求要開研討會，要求這個研討會一定要加加美參加，編輯部很害怕，就答應了，1972年秋天的事情，一共30多個人在會議上，30多個毛派，他們都說我是spy，我是日本反動派的手下，都是沒有什麼根據的，從中午開始到晚上9點受到他們圍攻，但我不怕，因為我自己有很多港人的好朋友，一定要為了他們辯護。第二次是在情況雜誌上發表文革期間好幾十萬人失蹤，親毛派的學者都認為我的說法是一種故意的謠言，很嚴厲的批評我，我的觀點堅持就是文革不要全面的被否定，因為我看了出身論這篇論文，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有70年代中國民主化運動。因為王希哲他1974年7月在廣州的街上公開發表大字報，大字報題名是「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³很有名的。這是文革後的第一張大字報提倡民主，這時候發表大字報的筆名是李

³ 1974年，廣州街頭出現一張署名「李一哲」、呼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大字報，批評當時當局種種倒行逆施。一時間此大字報前觀者如潮，道路為之堵塞。公安追查後，發現這是三個年輕人的傑作，分別是廣州美術學院學生李正天、高中生陳一陽及工廠工人王希哲。三人後來都被重判，這就是著名的「李一哲」大字報事件。

一哲（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三個人一起寫的，王希哲是廣州紅旗派的紅衛兵，很有名的紅衛兵。1978年年底，一個探索雜誌的總編輯魏京生，他也是1966年初期紅衛兵組織的聯動（聯合行動委員會）的積極份子，1976年4月4-5日清明節，這時天安門廣場發生了規模相當大的學生抗議活動，這時候參加四五運動的大部分是原來的紅衛兵，所以1974年的大字報、1976年的四五運動和1978年北京春天，這一共三次的民主化運動，都是原來的紅衛兵他們作為主力軍發起的運動，我自己以為文化大革命在歷史上有相當大的意義。

問：老師認為為什麼這些人會發起民主化運動，是國內因素還是國際因素呢？

一般紅衛兵不太知道國際的事情，所以大部分是受國內因素的影響，為何會發起呢？我自己是認為「造反有理」，共產黨的獨裁是金字塔式，下面不能抗議、反抗上面，由上到下的命令系統是絕對的，所以一般老百姓看劉少奇和鄧小平都是一種天上的，像皇帝一樣的，不敢批評最高領導，但毛澤東突然提出「造反有理」，這樣他們就敢於批評最高領導人，當然不敢批評毛澤東，除了毛澤東以外所有的共產黨領導，他們都以為可以批評他們。我自己有關文革的著作當中，有提到血統論，血統論是共產黨搞獨大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很重要的手段，利用人事檔案，人事檔案跟一般文件不一樣，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中國原來要進行對外開放的，要採用日本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要利用部分資本主義的經濟，為了提高自己社會的生產力，要用資本主義的經濟方式，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想法。毛澤東第一次提出的時候是在1940年，他認為新民主主義實施要十幾年的時間，到建國前後也沒變，如果這樣，毛澤東可能採用改革開放，跟現在的改革開放一樣的政策，利用市場經濟。可是1950年發生朝鮮戰爭，並且確立了東西冷戰格局，這時1950年10月1日的國慶日，美國CIA有陰謀，動員在中國國內的反政府份子利用國慶日的慶祝活動要暗殺毛澤東，用小砲來砲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但這個陰謀事前暴露了，毛澤東很生氣，因此慶祝活動馬上停止，本來建國一周年的慶祝對毛澤東來說是意義很重大的，但還是要取消，毛認識到這個事實冷戰的對立給中國的負面影響是很大的。

然後毛開展三反五反的運動，特別是在城市裡要達到所有反共反政府的自清運動，很大的流血運動。他在這自清運動中，發現在中國還有這麼多反共反政府份子，所以他不認為現在要進行擁護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如果這麼做，就會有更大量的反共反政府份子聚集起來，所以他馬上下決心不要做新民主主義，所

以 1952 年決定採用社會主義總路線，他的想法是當時國際政治負面的影響，有很多人說為什麼毛澤東過早的放棄新民主主義的政策，我認為是因為中國受到美蘇冷戰體制的負面影響，為什麼美國情報局要搞暗殺計劃，因為中國共產黨當時已經決定組織義勇軍參加朝鮮戰爭，1950 年 7 月最後決定以義勇軍為方式來參加朝鮮戰爭，所以當時美國政府的好戰份子，他們用所有辦法要暗殺中國領導，這不是謠言，是真正可能發生的陰謀。

中國參加了朝鮮戰爭，開始了與美國絕對對立，所以這樣不太可能採用改革開放，如果中國願意受到經濟上的援助，就只能從蘇聯方面得到援助，但中國參加朝鮮戰爭的時候，蘇聯給予軍事方面的援助以當時美元來算是 13 億，美國在戰後日本的經濟援助也是 13 億，dodge line。⁴但蘇聯給中國的援助是有償的，要償還的，但美國給日本的援助是無償的，所以兩者的性質是不同的。

所以毛澤東不相信史達林，完全不相信，而且他怎麼能夠進行一種新中國的經濟政策呢？因為中國沒加入聯合國，並且經過朝鮮戰爭，跟美國絕對的敵對，所以西方國家不可能給中國經濟援助。雖然受到蘇聯的援助，但就可能要服從蘇聯，所以這兩個走向都是走不通的，最後毛澤東就決定要搞一個農業集體化的方法，1953 年 3 月史達林去世，1954 春天赫魯雪夫第一次訪問北京，跟毛澤東見面，這時他提出蘇聯可以給中國很大的經濟援助，並且主要的部分是無償的，另外科技方面也可以援助，很多共產黨的領導都歡迎赫魯雪夫的說法，毛澤東也沒有反對，他也同意赫魯雪夫的經濟提案。可是 1955 年蘇聯組織了一個軍事同盟，華沙公約，華沙公約的主要目的就是以蘇聯為主，要控制東歐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做為附屬國，這樣東歐國家就成為隸屬國了，毛澤東看了這樣情況後，認為蘇聯給中國的援助是別有用心，要中國成為隸屬國。因此，在 1955 年後毛澤東不太相信蘇聯。

到 1957 年，蘇聯方面提出一個雷達網的提案，就是在中國國內要建立一個雷達網以及建立中蘇共同軍隊。1957 年美蘇兩大國都有很大毀滅力的核武器，當時兩大國開發的核武器是二戰在廣島、長崎的破壞力的 30 倍，美國在開闢制海權，蘇聯沒有制海權，美國的第 7 艦隊從美西出發可以到日本海，特別是航空母艦帶著核武器接近蘇聯，而蘇聯沒有制海權，就不能接近美國，所以赫魯雪夫就儘快要開發人工衛星和載人衛星，1957 年 10 月在國際社會發表蘇聯成功開發了衛星史普尼克，雖然蘇聯開發了載人衛星，但不能直接攻擊，如果美蘇之間發生核武戰

⁴道奇方針，駐日盟軍總部經濟顧問道奇提出的使佔領下的日本達到經濟自立的方針。

爭，蘇聯還是相當不利，要怎麼防止在日本海的美國第7艦隊的攻擊呢？就是需要中國大陸的雷達網的防預，在美國戰鬥機飛到蘇聯領土以前，在中國的空中把他打下來。為了這個目的要有雷達網，另外中蘇共同軍隊這個目的也是蘇聯為了要爭取出海口，蘇聯的出海口都是凍港，如果建立中蘇共同軍隊的話，他們也可以利用中國的港口，冬天也可以出擊，所以蘇聯要建立。都是為了蘇聯自己的國家安全，不是為了中國的安全。比如說，美國的戰鬥機帶著核武器要飛到蘇聯的時候，在中國的空中打下來，那戰鬥機就落在中國的領土上，而非蘇聯。毛澤東知道這個道理，很生氣，所以不接受蘇聯的援助，這樣開始敵對。

中蘇分裂的話，中國只好採用自力更生，作法實際上採人民公社。1958年8月，毛澤東發表「人民公社好」這樣的口號。可是人民公社果然過度理想化，導致很大的失敗，差不多三千萬人餓死，在人民公社1958-1961期間。可是毛澤東雖然知道這樣的大失敗，還是不放棄自力更生的想法，可是劉少奇和鄧小平自從1962開始採用經濟調整政策，這時候他們進行「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就是1979年改革開放鄧小平採用的方法，三自一包就1978年年底開始的改革開放的內容完全一樣。但是，毛澤東認為採用三自一包的後果會導致資本主義化，並且一定要對外開放了；如果對外開放了，他認為有可能對蘇聯、東歐或對以美國為主的西方世界開放，不一定是一邊倒。毛澤東認為解放前，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前，清末明初中國是對外開放的，但結果中國成為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如果採用自由主義並同時對外開放的話，不管對哪邊開放，都是走歷史的老路。所以毛澤東嚴厲的批評，所以他最後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方面的問題從現在的情況來看，還是當然有很多過份事情，殺過多的人，過多追求抽象的理想，這是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錯。

不過，毛澤東批評官僚主義階級一定會獨裁，並導致嚴重的腐敗，這個至今已經變成現實了。共產黨的獨裁是官僚資本主義的獨裁，不可避免的發生腐敗現象。我想很值得思考民主化真正的意義，現在某些領導高喊民主化的口號，高喊實行民主化，可是他沒發現實際上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是退步的，沒有進步，還是有很多退步的地方。特別是1990年代以後，某些領導衷心的要實行民主化，可是還是沒有發現比較有效的民主化手段，這方面我的想法是要反思文革。

現在我創辦了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2002年10月開辦，1997年開辦現代中國學部，這兩方面的目的明天再談。我本來21日要去上海開討論會，過兩天再去寧夏，但因為日本國內有流感，所以我的醫生跟我說中國海關會不讓我進去，要

在機場附近隔離檢查後才能進去，如果這樣的話，我每週三次的洗腎就沒辦法了，會很危險，所以就不去了。



加加美光行教授訪談 II

時間：2009/5/19

地點：日本名古屋，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研究所

訪談、整理：陳綺齡（台灣大學政治系碩士）、邵軒磊（台灣大學政治系博士後研究員）

問：今天想從您的研究方法開始談談？

答：我的研究內容和研究辦法，就是我在自己的方法論上，用一種批評的觀點來討論過去日本學術如何研究中國。這些研究者，或許無意識、或許有自覺的，各種的方法論我都要批評。我 1967 年大學畢業，進入亞經所開始研究當代中國問題，一直到現在研究中國已經 42 年，我自己覺得在日本學術界當代中國研究這方面在方法論上有很大的毛病和缺陷，一直這樣覺得，所以要把日本跟特別是外國研究中國的方法論一定要改進過來。比如說，你要研究日本，首先跟日本學者溝通時一定要使用日語吧，可是在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的漢語的能力一般來說，只有日常會話能力，但一旦要跟中國的學者要做學術交流，互相討論學術專業的話題時，他們都不太會講專業的漢語，一定需要翻譯，這是一個最代表性的例子。

我常想，為什麼日本中國問題專家有這樣語言能力上的毛病，後來發現，一般日本學者多用從歐美方面學過來的理論框架來分析中國問題，理論背景都是從歐美學術界引進過來的。比如說，一般為了學好學術理論，一定要去美國留學，國際關係、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方面等等的都要去美國留學，要研究第三世界的，不僅僅研究中國，也有研究亞非拉國家的，一般日本的學者第一要去美國，第二要去歐洲。改革開放後，日中間開始學術交流，很多日本學者要訪問中國，有時候要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我 1989 年初期好幾次跟各方面學會的領導一起去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這時候我們日本方面學者的態度，首先你以為中國學術界沒有什麼理論性的東西，大都認為中國學術界的水平沒有那麼高，在跟他們學術交流時，都不談理論東西，那為了什麼目的要做學術交流，他們所說的學術交流，學術是什麼意思，其實就是要知道中國學者的研究內容，日本學者的態度就是作為研究材料，要採訪他們的研究內容，中方學者的研究內容對於日本的學者來看只是一個研究材料，不是研究理論的。比如說中國國內要做社會調查，收集很多中國現實社會的材料，他們採訪中國學者，目的是為了收集他們的研究內容作為一種研究材料。

這不是平等的研究交流，跟中國方面不談理論東西，這就是日本學者的態度。

這不僅僅是日本學者的態度，歐美學者也是這樣的態度，比如說，1989年5月4日，五四運動滿七十週年，中國社科院在北京召開五四七十週年的國際研討會。主辦單位的部分學者是我的朋友，所以我5/3到北京的第二天參加他們的討論會，我參加的是民主與法治的小組，這小組的主持人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丁守和教授，坐在丁守和教授旁邊參加討論，坐在我對面的是英國著名漢學家 Josh Shrum。因為當年5月4日後過一個月發生六四，會議的氣氛相當緊張，特別是民主與法治這個小組，直接跟六四焦點相關，討論起問題時，特別中國方面學者特別積極發言。他們都說中國現在的情況，就是一般老百姓的識字太低，有很多文盲、半文盲，一般半文盲以下的程度佔全人口的30%以上，這樣比例太高的社會要馬上實現民主化是過早了，有很多與會人這樣主張，我雖然是外國的學者，聽他們意見後，還是反駁了。我提出的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那時法國老百姓的人口識字率比現在中國還要低，但他們還是能夠實現法國民主革命，那現在中國怎麼不能實現民主化呢？你們怎麼說現在民主化是過早呢？

我跟他們激烈的爭論，但我覺得很奇怪的是，坐在我對面 Shrum 拼命的記錄下來，好像拼命的要聽與會人的意見，好像都要把所有的意見記錄下來，可是他自己一句話也沒發言，旁聽的，他是很有名的漢學家，並在中國學術界裡的影響力很大，在這樣的研討會大家都討論很敏感的問題，話題很有意義的，但他完全沒發言，可是奇怪的是，小組討論會結束的全體會議，主辦單位請他代表發言，他就發言了，這樣的態度我覺得很奇怪，就是據高看下的態度。（問：那時候其他學者應該要有意見的吧，但是都沒有說話？）

歐美日的學者特別中國問題專家的研究方法論，我自己覺得有很大毛病，比如說我是美國經濟的專家，當然要經常要去美國跟美方學界的人士做學術交流，這時候如果只要採訪他們，沒有提出自己意見的，如果用這樣的態度來跟美國方面學者接觸，**一般美方學者不會容納這樣的態度，一定要聽我的意見。**這是一種平等態度。要聽我的意見的內容當然需要包括理論東西在內，所以這是理所當然方法論的基礎條件。另外，若有一個社會學者，在日本自己國內要做社會調查，要做輿論，這時候首先要準備問卷，做調查以前訪問對象市民、公民或有關人士，這時有一個基礎條件，就是要跟受訪對象說明調查的目的，並說明在調查結束後如何利用，若要對外公開發表的話，在什麼刊物上發表，何時發表，都要跟受訪對象說明的，這是一個起碼的條件，一種社會調查的倫理道德，可以說要用情報公開、資訊公開、說明責任，這兩個條件做社會調查時一定要負責的。可是這樣

的社會學者一旦有機會在第三世界做同樣的社會調查，其他名氣很高的社會學的教授、學者，他們在第三世界做社會調查，若在日本國內一定要遵守情報公開和說明責任，在第三世界的話完全不遵守，沒有跟他們的人民說明這個社會調查的目的、結果如何利用、結果在何時何地公開發表，完全不負責任的態度，為什麼呢？就是沒有平等公正的態度，調查員跟調查對象應該有的平等公正關係。

有些學者在第三世界做社會調查時，他們很輕視這種平等關係的，還是據高看下的態度，這樣的態度一定要改正。(第三)另外，去美國留學的日本人，一般留學的目的是為了學好學術理論，或為了拿好專業領域的學位，可是去中國留學的日本學生，百分之九五以上都是為了學好漢語，不是為了拿好學術學位，留學的目的不是為了學好理論，一般每年平均一萬五千個日本學生去中國留學，但大概有一萬三千人學好漢語後馬上回日本，留學期間平均一年左右，超過一年，兩年以上的日本留學生很少，要去印度的或非洲的，有的在非洲待一年，他們去非洲的目的不是為了學習非洲學術界的理論，中國學生的態度也是一樣，一般中國學生去美國留學目的都是為了拿好學位，如果留學的目的是拿好學位的話，起碼要待三年以上的時間，所以不僅僅學好日常會話，還能學好專業方面的會話溝通能力，這樣學生的態度不管是日本、歐美學術界還是據高看下，在第三世界裡沒有什麼東西值得學習，要去第三世界的目的都是**為了收集材料，不是為了學習**。

相反的，第三世界的人去歐美日國家留學的目的是完全相反的，他們認為歐美日這些先進國家有好多東西值得學習，所以他們要去先進國家留學，這是學術界的價值觀，學術價值結構是金字塔式的差別，在頂點的是美國的學術界，第二層是歐日，第三層是東南亞和中國，第四層是貧窮國家。但我認為這樣的價值觀太不適當了，因為明治維新時，來到日本的英國文學家赫恩⁵，娶日本妻子，改姓小泉。他研究日本社會和文學，他的研究態度不是旁觀的、做為第三者的態度，不僅僅仔細地研究日本文學界各方面的問題，同時做為文學家跟日本的作家很頻繁的交流和溝通。他自己說學到很多好東西，如果自己還在英國的話，不能學到的東西到了日本後才能學到，自己發現了很多新的東西，並跟日本女人結婚，在東京大學教書，那時候日本一般老百姓的情況是很貧窮的，英國經過工業革命已經發展起來，英國的經濟水平跟日本相比差距很大，赫恩看日本不是據高看下的。赫恩後來成為最有影響力，學術層次最豐富的日本問題專家，我們應該把這樣學

⁵ 小泉八雲（1850年6月27日～1904年9月26日）是一位日本小說家，出生於希臘。本名派屈克·克拉夫卡迪奧·赫恩（Patrick Lafcadio Hearn），1896年歸化日本，改名為小泉八雲。

者做為目標，來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論。

我昨天介紹的板垣與一，亞洲政經學會的創始人之一，他在二戰期間，原本是一橋大學的副教授，大學派他到新加坡，做當地軍事政府的文官，雖然他是殖民地統治者的文官，但他同情當地人的民族運動。自己不怕危險，支持他們的運動，給他們大的幫助，他後來回國後，研究印尼和馬來西亞的政治社會問題，不是做為第三者旁觀的態度，有很濃厚的主體性，一直保持自己的主體性來研究印尼問題，（問：自己作為印尼的研究者的主體性）這是很重要的態度，比如說你是台灣人，作為台灣人研究台灣本國的問題，一般作為第三者旁觀者研究自己本國問題的，這個研究內容沒有多少意義，本來這樣社會科學的研究當然要有客觀性，可是雖然要有一種客觀性，如果研究上沒有什麼目的的話，主體沒有一個自己追逐的目的的話，這個研究沒有多少價值。

比如說，研究台灣的經濟問題，全面的承認台灣的經濟現狀，認為沒有改革改進的需要，那就為何要研究台灣經濟呢？要研究台灣經濟首先要有自己的目的，目的的意思就是自己知道台灣的經濟現狀是有問題的，要解決這些問題，要把現狀改進過來，有目的才有研究價值。

問：問題意識吧。

答：是目的意識。一定要需要這樣，如果研究外國的，研究當代中國或第三世界，這時候我不是那個國家的國民，雖然是外國人可是沒有什麼目的，那就同樣沒有研究價值，一般來說，社會科學也好，自然科學也好，有一個研究的前提條件，首先需要發現研究對象現狀有問題的，如果不能發現要解決的問題，就沒有研究價值。

問：那麼，老師您中國研究的問題意識是什麼呢？

我昨天送給你的那本書「鏡子中的日本與中國」，就是中國裡面有一個日本，日本裡面有一個中國，這個很奇怪，日台裡面也有同樣的關係。（問：是說歷史的關係嗎？）不只是歷史的關係，我的書有提到，公元八世紀，約720年左右，中國揚州鑒真和尚來到日本，他給日本佛教的和尚講戒律，來聽他講戒律的和尚超過一百人，可是沒有翻譯，直接跟他們講，日本的和尚都聽得懂，為什麼這樣呢？當然有歷史上的原因，當時因為日本人文化界還沒有開放假名文字，所以讀書時讀法，所有的文件因為原來日本社會裡沒有文字，公元三世紀前後中國的三國時

代，從中國大陸或從朝鮮半島，大量的漢字流傳過來，都是渡來人，有的是漢人有的是朝鮮人，他們渡來人來到日本，帶來了很大的漢字，特別公元五世紀以後，大量的漢字從中國大陸的長江三角洲附近入境過來，日本的知識份子開始讀中國的四書五經和佛教經典，那時候因為日本沒有假名，所以讀法都是用中國漢字的發音，他們拼命的讀，大量的讀，有很多專業的漢字發音自然的學好了。

公元五到八世紀的三百年期間，有很多日本知識份子都拼命的四書五經或佛教經典，鑒真來到日本給日本佛教和尚講戒律，他們都聽得懂，因為和尚讀經時都要用到朗讀，朗讀對聽力很有幫助，朗讀時的發音自己的耳朵可以聽進來，所以一方面可以學好發音，一方面可以增強自己的聽力。公元八世紀時候的很多日本年輕的和尚他們的漢語能力相當高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呂⁶是知識份子，他到中國長安留學時，考上科舉，成為進士。他的教養水平很快的提高了，超過了一般中國的讀書人，所以唐朝皇帝玄宗很愛賞他，重用他，一般的文官是不能坐在皇帝旁邊的，他是一個外國人還是能夠坐在皇帝的旁邊的，很了不起。現在的日本人都說阿倍仲麻呂是天才，可是我不認為這樣，因為當時日本知識份子來中國留學以前已經有漢語能力，並有一定的漢文的教養水平，相當高的。到中國長安以後學完很多東西達到更高水平，當然比較容易超過一般唐朝的知識份子。還有一個佛教的空海和尚，也是他的徒孫，一般人認為他是天才，可是我覺得這也不是。所以要研究古代日本，首先要研究中國古代，要研究漢文，後來公元12世紀平安時代的後半期，日本人開發了假名，可是還沒有開發現在訓讀的讀法，要讀漢字時，現在有兩種讀法，一種是音讀，一種是訓讀，訓讀是一種用假名來讀的，比如說「讀」這個漢字，用訓讀念做よむ (yomu)，用音讀的話是ドク (doku)。其實，doku的發音原來是中國古文公元五、六世紀時的發音，doku與讀有點相似吧。這樣有兩種讀法了，到了鎌倉時期中半期，開始使用訓讀法，雖然現在也有音讀，可是音讀的發音沒有四聲的區別，現在都是拼音，沒有上下發音的區別，差不多公元13世紀後半期，確立了用日本訓讀來讀漢文的經典，13世紀到17世紀江戶時代三百多年，一直使用訓讀的讀法，所以日本的知識份子不能與中國人或朝鮮人溝通了。

因為讀法不一樣，但書寫可以溝通的，可是直接要談特別很多文學方面和理論方

⁶ 阿倍仲麻呂（日語：阿倍 仲麻呂，あべの なかまろ，698年—770年），是出身日本的唐朝政治家、詩人，在中國時取漢名晁衡，又作朝衡、鼂衡，字巨卿。阿倍仲麻呂出生於日本大和國（今奈良縣），為日本奈良時代的遣唐留學生之一，後參加科舉考試，高中進士，留唐任多項要職。「阿倍仲麻呂」又寫作「阿倍仲麿」、「阿部仲滿」。

面，就不能用漢文發音來溝通，文化上開始斷絕。到了江戶時代，有一個文學理論家荻生徂徠⁷（Ogyuu Surai），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運用儒家的教誨，以維持政府和社會良好的秩序。他認為，日本人的情感要讓自己表達出來，才能培育出華人文學在日本的願景。徂徠吸引了大批追隨者並吸收他的教誨，且建立了徂徠學校，並在現今的日本開設儒家獎學金，影響力甚遠。

他認為，日本的知識份子不能跟中國人或朝鮮人直接交流，因為語言上有很大障礙，可是公元八世紀以前的人都能直接與中國人朝鮮人溝通，可是過了八百多年到江戶時代，一般的日本人完全不能跟中國人朝鮮人溝通，語言有很大障礙，可是十七世紀中半葉，他提出我們要回到公元八世紀以前的文化，就是要讀漢文經典時，要直接用中國的發音，讀法要回到古代的日本，能夠直接跟中國人朝鮮人直接溝通。在荻生徂徠時期，中國文化就是從古代到公元十七世紀連續的發展過來，所以有很多日本的讀書人願意學中國古代的經典，孔子論語等。可是當時代的著作、那時候明末清初的中國佛教或儒教等就沒有學習，出現很多毛病。所以要回到原來古代日本讀中國經典的研究態度，要用中國的讀法來讀經典，比如說要讀英文時，如果不能使用英文的發音來讀的話，能不能理解英文的文化呢？同樣的道理，荻生徂徠這樣很嚴厲的批評當時日本漢學保守的態度，雖然他提出這個問題，但同意他支持他的漢學家很少。

東條英機⁸，中日戰爭爆發時的日本軍部的最高領導之一，特別是大東亞戰爭開戰時候日本的頭號人物，他是很愛好漢語的文化，比如說書法和唐詩，雖然如此，但他看不起當代的中國文化。（問：為什麼他尊敬古中國文化而不尊敬當代中國呢？這樣的狀況是為什麼呢？）有各種原因，一個原因是鴉片戰爭後，中國被歐美列強國家打敗，變成一種半殖民國家的地位，可是跟中國完全相反，日本明治維新後，沒有被打敗，並且自己追逐現代化的道路，並很順利的成功的發展起來，並實現了富國強兵的目標，所以有很多日本領導人都認為中國被列強國家打敗，沒有達到現代化的目標，是因為當代的中國人在精神上有很多的毛病，沒有進取的精神，所以被打敗，我們就有這種精神，進取革新的精神，所以現代化順

⁷ 荻生徂徠（1666年3月21日，江戶，日本 - 1728年2月28日，江戶），筆名武津徂徠，是日本儒家哲學家，被形容為在德川時期最俱影響力的學者之一。

⁸ 東條英機（1884年12月30日－1948年12月23日）。生於東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任日本的大將和第四十任首相（1941年10月18日－1944年7月22日），是二戰的A級戰犯，任內發動攻擊美國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戰後被處以絞刑。

利成功的實現了。所以當時的日本看不起中國。

並且有一個問題，當時有很多日本人會講漢語的，比如特別在滿鐵調查部工作的還有其它殖民地統治建立的研究所，裡面的知識份子會講漢語的，他們的漢語水平我剛才跟你說明的那樣，不是為了跟中國人做實際上平等公正的交流的，所以要跟中國人聊天時不要用專業字，比較多人會講簡單的會話，但一旦要談專業的、比較高級的漢語，那他們就不會講。這是因為日本人從公元 13 世紀以後要讀中國經典時，用訓讀的讀法來讀，雖然看過很多，像東條當然看過四書五經，也看過佛教的經典，可是不能用專業字來跟當代中國人做交流，所以不知道當代中國人有多少教養，只從表面來看他們沒有進取的精神，所以被列強國家打敗了。而我們一直有讀中國寶貴的四書五經和古代經典，所以我們的教養水平相當高，所以要吸取西洋文化的，這時候已經有自己的基礎，所以能很順利成功的吸取西洋先進文化，自己驕傲的這樣想。原來我們日本知識份子都有一定水平的教養，所有的讀書人都要讀四書五經和佛教經典寶貴的經典，都要讀過看過，所以都有一定水平的教養，所以到明治以後，要吸取西洋文化時早就有教養的基礎，所以順利地成功地能吸取西洋先進文化，而中國在古代時有很寶貴的文化，可是到了近代，雖然有很寶貴的古代文化的背景，可是他們的基礎沒有好好地活用，所以不能吸取西洋先進文化，這樣被列強國家打敗。

他們是這樣想的，**中國文化的最好的學生是日本，也可以說中國文化的正統的後繼人是日本人，不是中國人。**不僅僅東條，還有當時很多的知識份子都這樣想的，所以看不起中國，所以這樣的問題，如果江戶初期那時候日本的讀書人都支持荻生徂徠，回到古代日本的讀中國古代經典的讀法，那江戶時代也好，還有到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讀書人經常跟中國讀書人能夠直接接觸，那就當然能理解中國文人的實際情況，可是那時候公元十三世紀以後一直到明治時代和大正、昭和時期，日本人不能跟共時代的中國人溝通的，只能表面來評價。

問：對您而言，什麼是近代？

答：近代始於東西互相接觸的時候。

京都學派，戰前有一個漢學家小島祐馬，最有名的學派，他們創辦了自己的機關雜誌，特別創刊號說明京都學派要用荻生徂徠提倡的讀法，要回到古代日本的漢學，因為他們都主張 1940 年代的當代中國有很多文化方面的革新人物。比如說胡適，他們都有進取革新的精神，先進的精神，可是當代日本一般對中國的評

價有很大的偏見，看不到這種清流人物的文化運動，因為他們要讀中國文獻的時候，用日本假名的讀法來讀，所以要把這種態度改變過來，這就是京都學派的說法，只有京都學派這樣提倡。

可是戰後，一般的日本人沒有把漢學的研究態度改進過來，一直到現在，可是現在有一些進步了，從哪開始進步呢？奇怪，日本的外務省培養他們人材的時候，進來的年輕的外交官都要派他們到台灣的師範大學，那裡有一個國語教學中心，專門給外國人教國語。特別年輕的外交官都要到台灣師範大學，一般留學兩年，拼命學漢語。他們的態度還是學好漢語，不是為了上研究生，也不是為了讀碩士或博士，而是集中學兩年的漢語，所以他們的水平相當高。我認識了一些像這樣年輕一代的不到 50 歲，30~50 歲的之間的外交官，從事中國或台灣方面問題的年輕外交官，他們的漢語能力相當高。(1:30:40)

現在學術界裡面開始有一些改變，年輕人要去台灣，台灣師範大學有什麼長處？一個長處是：如果去中國留學的話，留學生樓沒有中國學生，日本學生不能住在一般中國學生的學生樓，有這樣的規定，一定要住在外國留學生的學生樓，他們的留學生樓跟中國的學生樓隔離了，跟中國學生聊天的機會我想很少，跟泰國來的、非洲來的、印度來的這些外國留學生跟日本學生可以互相聊，因為他們都住在同一個學生樓，留學生之間當然互相可以接觸，共同語言是漢語，他們互相聊天的時候用漢語，可是他們的漢語就有問題了，不會專業字，很少用。可是到台灣師範大學留學的，一般外國留學生都可以跟台灣學生一起住，住在同一個學生樓，經常可以跟台灣學生聊天的，這樣進步的很快，課外也可以順便鍛鍊自己的語言能力，所以日本的外務省要培養自己的人材時，把自己年輕的外交官都要派到台灣的師範大學。

我自己跟你講了好多東西，有時候用專業字，為什麼我會講這樣，我讀中國文件材料的時候，都用漢語的發音來讀，這是我的習慣。反過來，日常會話我不會講，真的。1967 年開始研究當代中國問題，那時是文革爆發的第二年，一般只有友好份子，比如說日中友好協會的會員，有這樣身份的才能去訪問中國，一般的日本人不能訪問，特別我剛開始的時候，因為我大學時的專業是社會學，本來想要到印度做社會調查，社會學跟社會調查是離不開的，互相關聯的方法，我收到命令開始研究中國問題的時候，要去中國在農村地區希望能社會調查，這是完全不可能，我雖然受到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和很同情文革，可是不願意參加這種友好團體的活動，因為他們的排他性很強。這是一種政治團體，政治黨派。我雖然

有一個革新的、新左派的精神，可是我最討厭的是有排他性的派系，所以完全不願意參加這種友好團體的活動，那就沒有機會訪問中國。所以研究當代中國的時候只好採用文件的研究方法，文本研究，如果採用這種文本的研究方法，我的語言一定會很落後，會話能力當然不行，其他專業方面的話題也不能跟中國人溝通的，所以我自己想，讀中國的文本書本的時候，一定要用中國的發音來讀，用這樣的讀法，那就專業字的好多發音聽懂，也可以會講了，可是一般會話，很少也完全沒有機會直接到中國去訪問，比如說這個中國菜很好吃，或是各種各樣的日常會話，這我講不太好。

一直到1982年，因為1972年日中兩國建交，所以開始日本人可以直接去中國觀光旅遊，現在三通裡面中國人要去台灣也可以個人單獨的觀光旅遊吧？（預期2011開始。）同樣的，日中建交以後，本來能夠去中國觀光旅遊的，可是不能單獨個人身份去的，一定要參加旅行團，以團體全面為身分才能去訪問中國，我不要參加這種團體，還是不要去。最後到1982年，日中邦交後過十年讓個人去了，那就開始去中國訪問，馬上認識了很多中國朋友，特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在那裡找朋友，找到了一些朋友，（問：1982年去了幾次中國？）（答：去了兩次，第一次去是3月，第二次是12月）首先，我認識了中國社科院的一些朋友，1985年前後認識了中國中央政府機關部分的研究員，都是40來歲的年輕人，跟我同一年代比我小幾歲。一個朋友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社會學方面，社會調查組主任白南風（註：應該是社會學部主任），體改所就是趙紫陽他們的機關，所長是陳一諮，副所長是王小強，社會調查組的主任是白南風，我特別跟王小強和白南風兩個人是好朋友，可以說是中國朋友之間關係最親密的朋友之一。

王小強在1989六四發生以前跟所長陳一諮到美國去了，他們去美國的目的是為了避風頭，好像是因為趙紫陽故意地派自己研究機關的所長和副所長到美國去了。可是白南風留在中國國內，遇到災難，我5月3日到北京參加五四七十週年的國際研討會，那時候跟著白南風一起要看北大、北師大、清華的情況，要看他們校內的大字報，白南風一直陪著我，一個一個跟我說明大字報的內容還有這些名牌大學學生運動的實際情況，不僅僅互相聊這些敏感話題，還聊很多我們個人事情，比如說談戀愛、養病問題。因為我那時候有病，他陪我去看中醫，這樣我們過了很愉快的十天時間，十三號我離開北京，五月十七號三個研究機關共同發表聲明文件，後來我知道，這個聲明的起草人就是白南風，這個文件是很名的文件（《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向當時在天安門裡面的差不多百萬人學生靜坐、絕

食活動，可是他們三個機關的代表人都認為這樣繼續下去很可能發生流血悲慘的事情，聲明裡面說你們學生已經得到了一定的目的了，民主化的一定的目的了，所以再不要繼續靜坐、絕食，這樣容易引起一種悲慘的後果，所以馬上要撤退，這就是三個研究機關的聲明，這樣白南風的名氣越來越高了，就是學生都知道起草人就是白南風。

可是六四發生後，過來了兩個星期，6月17日時，白南風在自己家裡時，突然公安突襲抓他，這樣他開始作牢，我的中國朋友馬上給我來電，知道我朋友白南風被抓做牢，並且他的嫌疑很嚴重，在趙紫陽背後有白南風，白南風是社會調查組的主任，做過大量的社會調查，並且調查的範圍在中國全國東南西北都做過的，一般在中國東南西北做調查的時候，雇用當地名牌大學的學生做調查，實際上這個調查白南風跟王小強他們兩個做為領導在全國範圍內，特別這方面工作最有貢獻的白南風，所以白南風跟全國各地的大學生都有一定的關係，發動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幕後人是趙紫陽，就是當時鄧小平和李鵬他們認為趙紫陽有這樣的嫌疑，有什麼證據呢？（1:53:58）就是白南風在他的背後和他的手下，在全國範圍內，跟各名牌大學的學生活動家互相拉關係，發動這次的活動，就這樣白南風突然變成一個關鍵的人物，很多中國朋友跟我說白南風很可能被處死刑，我很著急。因為我這個本來不跟你說的，可是我亞經所一個我的後輩的女研究員，她跟一個已婚年紀大的研究員談戀愛，我自己認為這個年輕女研究員很有前途，如果這樣跟已經有孩子結婚了年紀比較大的研究員談婚外情，我想她的前途會受到影響，我很擔心的，所以剛剛這個時候女研究員收到研究所的命令要到北京做為海外研究員的身份，要待兩年研究，所以我給他介紹白南風。白南風當時差不多39歲，可是還沒結婚，我喜歡他的個性，個性很好，年紀雖然比較大，可是很有精神。所以我介紹那個女生給他，我的意圖要給他們機會互相談戀愛，結果開始談戀愛了，我很高興。1989年5月，去北京跟白南風一起的時候，突然白南風跟我說一定要到我家來。我一般跟他見面都在體改所，或在外頭的飯館，過去一次也沒有去他家，因為我知道他家裡的情況是亂七八糟，因為是單身漢，一定是亂七八糟，所以他不能招待我到自己家裡，可是他突然提出一定要到我家裡來，我覺得有點奇怪，還是跟他一起去了，進到廚房那邊看見了我的後輩女研究員。所以我覺得很高興，真的很高興。

白快要結婚，可是剛剛這個時候被抓走，並且我中國朋友都說他很可能被處刑，裁判的判決很可能是死刑，所以很了解，可是沒辦法。後來，李鵬和鄧小

平他們給趙紫陽嚴厲的處罰，開除黨籍，不僅僅開除黨籍，也可能要召開一個公開的裁判，給他下一個很嚴重的罪刑。害趙紫陽背後跟全國範圍的學生活動家積極份子互相拉關係的發動運動關鍵人物白南風面臨很大的危機，最後，六四發生的第二年，組裡面12月17日，他被放了，他被放的第二天我在北京的大酒店大廳跟他見面，因為我另一個中國朋友事前跟我電話過來，說12月17日，白南風被釋放，問我要不要跟他見面，當然我要跟他見面，北京有一個五星級的大酒店長富宮，我在長富宮的大廳跟他見面，我的研究的方法跟一般的中國問題專家不一樣，很重視個人的關係，為什麼呢？比如說我跟白南風互相交流，這時不是做為一種旁觀跟他交流，做為一個個人跟他坐交流，他也知道我這樣的態度，他是高地位的研究員，做為趙紫陽手下的高級研究員，工作挺忙的，還是重視跟我的個人關係。互相聊天的時候，我經常跟他說他抽菸太嚴重了，連續的抽，這一點我討厭，經常跟他說不要抽，這樣損壞自己的健康，你有很重大的責任。因為擔任中央政府的很多很多關鍵的工作，因為他沒有結婚的，對自己的健康好像無所謂的態度，所以我想到一定要給他介紹一個好對象，這樣想的時候，在亞經所的一個後輩女研究員他的境遇，所以讓他們互相見面，開始的時候女研究員（他原本也認識白南風，見過）有一次跟我說，日本的學者要跟白南風見面的時候，一定要問向他提問現在趙紫陽的經濟政策，還有其他各方面的政治等等，現在你對改革政府有什麼想法，日本的學者都這樣向他提問，沒有其他話題的，可是我跟白南風要互相聊天的時候，聊到的話題有很多特有的，女研究員好像覺得很奇怪，加加美先生你為什麼跟白南風沒有談到具體的政府方面的問題，要談好像無聊沒什麼重要的話題，互相廢話很長時間。通過這樣的個人話題我知道他的性格、個性，真正的人格，都通過這樣個人之間的聊天，我能夠知道的。

所以5月19日，中共中央下令戒嚴，在北京下令戒嚴，日本廣播電視台NHK開了一個政治討論會，這時候參加座談會的是一個外務省的高級幹部、中島嶺雄、東大教授和我一共四個人參加這個討論會。主持人是NHK日本廣播電視台的，他首先提問，有這樣的說法說這次天安門事件在背後操縱的是趙紫陽，你們怎樣說明這樣的說法呢？外務省的高級幹部、東大教授和東京外語大學的中島嶺雄教授，他們都說這次天安門事件在幕後確實有一些人物，也可能趙紫陽在幕後，他們都同意這樣的說法，只有我一個人說不可能這樣，這樣回答，絕對不可能，我想這次活動學生運動一般來說趙紫陽研究機關的手下的幹部都不願意產生流血後果，大的流血後果，他們一定要勸告學生要撤退，從天安門廣場撤退，我這樣的

提出來，後來看了這個節目的我的好多朋友，都是學者，他們打電話過來說，你加加美有什麼證據根據這樣說，我說沒有根據，可是我相信這樣，那你的這種態度太不科學，他們都批評我。可是我心理上有根據，**客觀上沒有根據，心理上有根據**，後來過幾天大家都知道5月17日，三個研究機關共同聲明說要在天安門廣場裡面靜坐的學生向他們請求馬上撤退，並且共同聲明的起草者就是白南風，為什麼我13號離開北京的。(2:13:03)

沒有跟白南風做連繫，還是知道他的想法，因為我們互相之間有個人關係，知道他的想法，所以心裡上有根據。我沒有什麼內部文件，可是還是通過個人關係知道中國很多敏感問題的實際情況，這就是板垣與一，戰前在新加坡的時候，他跟搞民族獨立運動的積極份子，給他們幫助，不是做旁觀者，是做為朋友跟他們一起的，所以他的研究內容是很豐富的，真是很豐富的。

問：那請您試著談談您的研究方法論？

答：首先研究方法論上要有目的，沒有目的的研究，這方面 Max Weber 他提倡的客觀性或者價值自由，德文的價值自由是 Wertfreiheit，Wert 是價值，自由是 freiheit，所以 Wertfreiheit 就是價值，Max Weber 提倡的客觀性和價值自由這兩個概念，有很多日本的社會科學學者對他誤解，要保持一種旁觀的態度來研究，這就是客觀的態度和價值自由的態度，開始的時候這樣想，很多日本學者理解 Max Weber 的方法，可是後來有一些研究 Weber 的學者，特別是內田芳明和大塚久雄，他們說明 Max Weber 這種價值自由的概念的實際內容，目的論的分析就是目的和結果（我的那本書昨天給你的裡面有詳細的說明），目的和手段，還是你看我的那本書關於價值自由的說明，現在給你詳細的說明我頭腦有點混亂。

比如說，自己有目的，目的論，這樣地很明確地意識到自己有目的。因為所有的社會科學研究不可避免的要有一個目的，關鍵的問題是這個研究學者能不能認識到這一點，如果一個學者自己認為要客觀的研究，所以能夠排除自己的目的，這樣想的話就是沒有明確地意識到自己的研究裡面有目的，那就這樣受到目的論的負面影響。比如說，所有的研究都不可避免的要目的，比如說研究中國政治，一黨專政的這方面的研究，國外的學者和中國國內的學者也研究這問題，這時候結論是要三權分立，中國的獨裁太輕視三權分立互相監督，政治運行方面沒有互相監督的功能。(02:21:19)

所以獨裁的負面起作用了，這樣他們要說要建立一個能夠互相監督的三權分

立的政治系統，下了這個結論的研究原來有目的的，就是對中國政治一黨專政的現狀有一種批評，早就有一個把它改進過來的想法，批判的研究這個態度裡面當然不可避免的有一個目的的，比如說研究公害問題也好，研究公害環境污染問題以前的這個學者早就有一個看法，中國公害的現狀一定要改進過來，怎樣改進，並且為什麼發生環境污染，要研究這問題的時候要發現引起環境污染的各種原因，這時候有一個目的，要把這個原因克服過來，所以有目的的，可是研究中國環境污染問題的這個科學研究員，他自己認為自己搞得是客觀研究，他自己認為能夠排除自己主觀的目的，這不可能的，所有問題都是這樣，要正面的評價還是要負面的評價呢，要研究中國文學問題也是一樣，有一個文學方面的事情，這個研究員怎樣評價呢，沒有評價的研究文學問題我想當然不可能的，要正面的評價呢還是負面的評價呢，都有這樣的態度，所以價值和目的都不能排除的。

問：請您舉個例子？

實際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很多科學研究的學者他們受到批評批判，不能繼續搞研究工作，很多名牌大學都要關門，中國社會科學院也停止工作，為什麼他們受到這樣壓力，很簡單的，大學裡面搞學問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裡面搞研究的、中國科學院搞自然科學研究的，他們學者都有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跟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互相衝突的，所以他們受到壓力，最後不得不停止自己的工作。所有的政治當然有目的的，政治就是追求自己目的的行為，開始研究看起來好像沒有目的，如果完全客觀的沒有什麼目的的，那就獨裁的也可以容納這樣的科學研究的，可是自然科學不僅僅社會科學，而且自然科學都有這樣的自己研究的目的的。

又比如說，自然科學的研究也是這樣，一個 DNA 研究，如果把一群 DNA 不要改進，保存 DNA 的現狀，不要改進，那就不要研究了，所有問題是這樣，我要研究 DNA，這時候沒有目的的，只要研究 DNA，這是一個大學的學生，那就好，要考上研究生的考試，那就 DNA 是什麼東西，這是考試卷上的問題，那就要知道 DNA，這樣的學習。

學習本身當然還是有目的的，有要上研究所、要上碩士、要上博士這個目的，可是學問的內容本身沒有什麼目的，考試上需要的學習，已經有答案了，早就有答案了。答案如果要否定的那就考不上，有答案那不要研究，只要學習，所以高中生考大學的，或大學生考研究生的，這時候學習的同時一般沒有目的的，可是

如果要在研究機關搞研究，那就不僅僅社會科學而且自然科學也要有目的的，我要研究 DNA，DNA 有什麼東西早就有答案，那就不算什麼研究了，首先要知道答案，知道答案是一個前提，然後要研究 DNA，DNA 的現在的情況把他改進過來，那個環境問題和所有問題都有目的，Max Weber 所說的客觀的研究不是否定科學要有目的的前提。要有目的時候，要發揮自己的主體性，（附和：就是自己想要研究的目的的是什麼），對對對，這就是科學研究方面的，一定要有主體性。（問：有目的是可以的，但是在研究的過程中要用客觀的資料還是方法）對，所以，比如說，科學研究的對象是外國的，外國研究，這時候我做為一個外國人研究中國的時候，自己要有一個目的，這個目的如果侵犯中國公民的主權那就有問題，這方面就是方法論上一定要克服。

又好比說，你現在想研究加加美。你做為外國人研究加加美，為什麼要研究加加美就是你的目的了，這個目的有時候跟我的目的互相衝突的，有時候互相互利的，可是有時候互相衝突，這不一定，沒有一定的答案，要看情況來決定，有時候冒著互相衝突的危險還要研究，對有沒有衝突的可能這方面要有一種敏感的意識，比如說研究中國污染問題的，受到損害的受害者他們看當地的環境污染的看法，跟環境污染來源的工廠的工人的看法跟受害者不一樣，還有當地的地方政府對環境污染的看法他們的目的也不一樣，剛才我說的工人對自己工廠環境污染的看法也有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和目的，我研究整個主體一起交錯的，這種環境污染現象做為自己研究對象搞研究，這時候我也要有自己目的的，我要揪出受害者的立場，或者我要揪出工廠工人的目的呢？我採用什麼立場，和評價這個環境污染現象具有分析、研究內容不一樣，一旦我站在受害者立場，跟著他們一起批評環境污染，或者有時候向地方政府或向中央政府，我做為外國研究者提出意見或提案，最後政府接受我的提案，把工廠撤退，那工人就失業了，大量的工人失業，那他們的生活怎樣處理，我自己外國人不負責任，這樣的態度行不行？那如果我站在工人的立場，那受害者的權益，那就大大地損害他們的權益，這就是有問題的，引起問題，本來不可幫哪一方研究的，一定要有自己的目的，可是自己的目的跟研究對象各方面的主體，都有互做互動，有時候互利有時候互做衝突，這樣問題一定要發生這樣的情況。（02:40:00）

問：請您談談其他印象深刻的中國研究者？

毛里和子還有其他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研究中國政治一黨專政的，比

如說現代中國政治研究的毛里和子，從名古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書⁹裡面提到，把中國的現在政治做為研究對象，他詳細的研究提出好多問題，可是他自己認為自己採用一種客觀態度，可是他的結論是「中國獨裁，沒有三權分立。」

怎樣可能實現三權分立這方面他仔細的研究，可是通過怎樣的路徑來實現三權分立的時候，當然首先要詳細的研究中國政治的現狀，一黨專政的詳細情況，當然詳細的研究，可是他的想法是最後經過什麼樣的路徑能夠實現三權分立，那就他的想法是三權分立是最好的東西的價值觀，並且目的是怎樣實現三權分立，這個有一種主觀的態度，實際上不可避免有這樣的（附和：這個就是他的目的性），可是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比如說當年的王小強也好還有其他中國共產黨黨內高級的主腦份子也好，他們當然要進行政治改革的，可是不像毛里和子那樣，隨便提出要實現三權分立，雖然心裡上或內心有這個目的，可是如果公開說出來那就太危險，所以不敢說的。在這樣狀況之下，怎樣漸漸的把中國的政治現狀改進過來，王小強也是一個學者，可是完全不像毛里和子那樣很多觀點很隨便說經過什麼什麼路徑能夠實行三權分立，對他們來說還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外國人當然不負責任隨他便，可是在自己國內共產黨內要進行改革不要那麼隨便，因為這意識到自己的目的，我跟白南風做好朋友，我知道他的想法、立場，我自己外國人研究中國問題，他就是做為中國人研究中國問題，他自己有目的，我也有自己目的，可是因為我們立場不同的，所以實際上我認識了白南風，如果一個外國研究員認識了白南風，向他提問中國的政治怎樣怎樣，向他提問，我們之間沒有什麼個人關係，那他當然回答的時候，沒有給我開誠自己實際的目的，只能說明一個表面上的東西，那就知道他的答案後，他是很保守的，我自己認為，他太消極太保守，這樣判斷的我想適當不適當？這樣我跟白南風互相建立了互相個人關係，他的性格、個性、想法我都知道，那就每個細節的經濟政治後面有他自己心裡想的目的都查覺到了，這是很重要的，如果表面上判斷他的提出方案的內容，那就不能適當的評價，這就是我重視主體性一個很大的原因。（02:48:01）有時候我跟他的意見互相衝突，可是這也無所謂的。

問：老師的意思是不是說，做為一個外國的研究者跟研究主體的本國的研究者互相交流，這樣做出來的研究才會真正是擁有自己的目的，但是也了解那個研究對象的目的，這樣子做出來的研究才不會太不負責任或是太以自己的眼光來看？

⁹ 毛里和子，《現代中國政治》（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1993）

比如說，採用文本研究，這時候有一個研究員，只好用這個文本，可是做為個人怎樣想，不是做為研究員，不是做為個人怎樣想，要有一個想像的能力，比如說，看了王猛，王猛是一個中國有名的小說家、文學家，看了他的作品，這時候不是做為一個科學研究的學者來看，當然有時候需要做為自己是文學家的立場來看王猛的作品，可是還是需要做為個人怎樣看王猛的作品，一次也沒有跟他見過面，也會知道王猛的文學作品裡面他的內心的主體性。

我想到劉再復。¹⁰劉再復也是六四時候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所長，劉也是我朋友。他的一個代表著作裡面有一個文學主體性這個主題的著作，所以有人說當然直接建立個人的關係是最好的，可是如果沒有機會跟對象人物建立個人關係，只能看到他的文本，並且他已經作古的人，歷史過去的人物，比如說魯迅也好、胡適也好，我看他們的作品，這時候還是有時候要有做為個人怎樣看他們的作品，發現他們魯迅和胡適他們做為個人在一個特殊歷史的場面怎樣想，這問題察覺到了，這就是一種科學研究方面的想像能力。

那做為個人的主體性就是，一般人都要死，要死的時候我自己的身分和地位都沒用處了。我自己做為社會人物，為了我自己的權益，差不多六十多年的人生當中，跟很多人建人際關係了，這個人際關係在要死的場面都沒用，我自己個人面臨要死亡的危機，並且要對待自己死亡的場面，這就是最典型的個人的主體性。比如說，我跟白南風做好朋友，我經常跟他說不要過度的抽煙，這時候完全忽視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對我來說也無所謂，當年最關心的是他的健康和生命，他也對我的病情有關心，這樣建立了個人關係。晚上互相有開一個研究會，研究會裡面中國人很重視座位的數列，主客坐在哪，一般主人坐在哪，雖然研究會看起來好像做為個人互相交歡，可是實際上帶著自己身份和地位互相聊天吧，那這就不是個人的關係。再三多次的跟對方開研究會互相接待，有人說我們跟他有一個個人關係，可是我不相信這樣。

比如說有的單位的負責人有時候請我去一起卡拉 OK，唱歌的，我們好像建立了個人關係，可是這不算，唱卡拉 OK 也是跟研究會一樣的，還是互相沒有離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的，所以這個很難判斷，日本人的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晚上跟

¹⁰ 劉再復，一九四一年生，福建南安縣人。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文學評論》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等職。八十年代，以〈論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論文學主體性〉等重要論文和《性格組合論》、《文學的反思》等著作，改變了大陸文學理論基本模式，斐聲於文壇。現任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客座教授。

對方一起去卡拉 OK 唱歌，或者喝酒喝很多，那就我們做為一個很好的朋友關係。可是這樣的關係很容易被破壞的，真正的個人關係是生命的關係。因為所有人的主體性是來自自己的生命的，比如說我一個中國朋友，改革開放後差不多二十九年期間，經過好多苦難，有時候受到批判，我親自看到他們的苦難，當然我作為外國人沒辦法給他們幫忙在他們吃苦的時候，我很同情，當然很希望給他們幫忙，可是不能，比如說白南風被抓坐牢，我一個外國人要給他幫忙，可是如果我外國人在外國公開搞活動，搞民主化運動，蒐集大量要求釋放白南風的簽名，比如說五萬人的簽名名單，然後把它提交給中國政府，這種活動能夠給白南風幫助嗎？當時我自己知道如果這樣做對白南風有更多不利，我做為外國人沒辦法給他幫助的，其它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所以很著急，雖然很著急可是沒辦法，這就是個人關係的，如果我是日本政府的外務大臣，那就可以跟中國的胡錦濤或當時的李鵬跟他要求釋放白南風，可是我沒有這個地位，一方面是學者的，我雖然地位很高的比如說外務大臣，向李鵬要求要釋放白南風的行為，這種行為對白南風有利不利不知道不一定的，有的時候很多不利的。(03:02:29)

個人關係是很微妙的，自己到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的研究方法跟其他人不一樣，我很重視人的主體研究員的主體，雖然不干涉中國的主權，還是要發揮自己的主體性。

問：那老師認為說外國研究者跟本國人研究者這兩個最大的差別其實是他們擁有的主體性是不同的，而且這也是最有價值的地方。

回：對對對。比如說，我剛才圍繞著社會學社會調查這個方法方面提出一些問題，公開情報和說明責任，如果一個學者研究自己社會自己國家問題，這是一種科學方面檢驗的手續，比如說我研究 DNA，研究 DNA 的科學研究方面，得到研究結果後，一定要把研究方面的所有的過程裡面發生的各方面的情報都要公開化，同時要做說明責任的義務，這個是很重要的。比如說原子彈，愛因斯坦或其它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物理學者，戰前在美國猶太的學者開始研究原子彈，他們都是物理學方面的，所謂質能物理學。他們最代表性的人物是愛因斯坦，他研究開發原子彈的，那時他認為原子爆發的能源，質子分離時候產生的爆發的能源，還有質子融合時候發生的龐大的能源的研究，利用這個研究的結果能開發原子彈，愛因斯坦知道這個道理，還是研究質子結合質子分離能夠產生龐大能源的研究，原來質子和原子他研究這個問題以前沒可能產生這樣龐大的能源的，所以他要把質子當時的現狀改進過來，有這個目的，要產生出龐大能源的這個目的，可是他

知道如果軍部利用這個研究結果的話，容易開發原子彈，他還是繼續研究，最後的結果就是美國成功的開發了原子彈，用導彈轟炸了廣島和長崎，殺死了大量無辜的公民，這個目的應該事前公開說明的，並且對這個研究結果他作為研究員要負責，這是科學的態度。(03:11:00)

1957年在加拿大 Pugwash 這個城市的召開了全世界自然科學學者的討論會，這個會議的名字後來叫 Pugwash 會議，這個會議主要的話題是自然科學人員的社會責任，比如說以後開發了 DNA 或者也可能開發人造的生命，研究 DNA 的科學研究員，將來很可能開發人造的生命，給人類世界引起什麼影響，這方面如果這個自然科學的學者自己認為，我的研究是科學客觀的研究，研究的結果怎樣對我無所謂，因為我追求的是科學客觀的研究，要發現真理的，真理沒有罪過，那我怎麼要負責呢？1955年以前愛因斯坦和美國的羅素他們共同公開發表一個 (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 聲明，要消滅人類最後武器的原子彈，這時候愛因斯坦才知道自己有責任。

所以到了 1957 年在加拿大 Pugwash 召開全世界科學會議，這時候都要談到科學研究學者的社會責任，到了六十年代，所謂分子生物學逐漸積極的開展起來，到了七十年代，有人已經公開說人類有一個能力，人類能造出一個生命，人造生命，如果這樣的自然科學創造人造生命的話，這在人的生活引起了什麼影響，所有的學者都要意識到這一點，並且都要負責，不僅僅這樣的問題，還有其它有好多問題，因為自然科學也要有一個研究目的，就是要把現狀改進過來，要開發新的技術或新的東西，新東西跟舊東西比較，新東西是否定舊東西的，要開發新東西的時候要否定克服舊東西，有這樣的目的的。自然科學方面，特別醫學方面發生了這樣的反省，同樣的反省，特別六十年代發生了一個患者受到醫療，例如動手術，手術的內容，如果患者不知道，只有醫生知道，不讓患者知道，以前是這樣，這個手術裡面有什麼危險，如果手術成功的話結果怎樣，失敗的話後果怎樣。在六十年代以前醫學界裡面患者都不知道的，可是六十年代以後特別美國有這樣的醫學方法，就是開始採用動手術以前一定要跟患者說明這個手術詳細的內容，並且手術的結果怎樣，如果手術失敗後果怎樣，手術成功的結果怎樣，還有除了手術以外有沒有其他醫療方法。這也要給患者說明，這樣就是公開情報和說明責任，在醫學界都逐漸的最後到二十一世紀比較全面的。

可是社會科學方面沒有這個辦法，特別外國研究，隨便說話不負責任，比如說中國一黨專政，一黨獨大，他們完全忽視三權分立，那就首先達到一黨專政，

中國需要達到一黨專政，外國人隨便可以說這樣，因為不負責任，這個結果怎樣，如果共產黨全面崩潰了，那結果怎樣，如果我是中國人，要追求政治改革、政治革新，那就要對這方面一定要負責，有時候我提出要打倒共產黨，那就在共產黨崩潰以後，中國怎樣，這方面我要負責的，不要隨便說，可是如果我是外國人，那就不負責任隨便說出來，我想同樣的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研究者，一般本國人研究自己國家的問題、自己社會的問題，那就一定要負責，**可是外國研究一般不負責任，這樣太不負責。**比如說，現在我剛才給你介紹醫療方面的案例，首先給患者詳細說明的手術內容，可是這時候要跟患者保持一個對話，因為不僅僅手術，醫藥方面的醫生給自己患者吃藥，吃了藥後有什麼效果，如果醫生跟患者之間沒有對話的話，醫生不能知道的，會知道的可是有時候來不及，如果保持對話的，患者吃藥以後覺得不舒服馬上告訴醫生的話，醫生自己想一想給他的藥有什麼問題，馬上找另外藥方更適合的藥給他吃，這樣發現問題越快了吧，如果沒有對話的，那有時候來不及的，所以同樣的道理，如果自己是本國人研究中國問題，一般自己的研究結果給中國的領導提案，中國領導接受提案來採取政策，這樣提案開始實現，可是然後結果怎樣，如果自己研究自己國家就馬上會知道，他的假說是錯誤的，他自己發現自己的前提的假說是有錯誤的，那就把它改變，可以改變，這就是本國研究員跟中國的現實有對話的關係，所以儘快的改變自己的假說，可是如果我是外國人研究中國問題，提案一些問題，如果胡錦濤接受我的提案，採取政策，我對提案的結果在中國現實當中有什麼效果，我對這個一種有主體性的研究員很有關係的話，我自己還是跟本國人一樣，可以把自己的假說改變，可是如果時間沒有儘快的跟中國現實的變化沒有儘快的反應過來，因為外國的事情，並且我對外國的現實實際上沒有多少關心，沒有給我反應過來，那就我剛才跟你說的過程，是一個科學研究很重要的手續，檢驗，檢驗的過程，本國人研究自己國家社會的，一般排除這種檢驗，可是外國人研究外國問題，一般不可能採用這樣檢驗的手續，所以作為科學方法這種外國研究有很大問題的，比如說你在台灣學術界介紹我的中國研究，你的主要目的是給台灣學術界介紹的，一般是這樣，開始的時候，你收到的反應是台灣學術界的反應或台灣社會的反應，那你的檢驗的手續還是從台灣學術界的反應來作檢驗，可是在日本方面，你研究加加美問題的研究內容如果馬上在日本社會裡面介紹，那就日本讀者給你反應，可是沒有這個過程的話，那就不可能收到日本社會的現實給你反應的檢驗手續，這是外國研究有限制的地方。所以不僅僅自然科學、而且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都要有

檢驗的過程，檢驗怎樣進行呢？就是學者研究者跟研究對象之間的對話，檢驗科學研究的重要環節和過程，所以這方面一般外國研究缺乏這方面檢驗的手續，這方面如果你跟我和其他日方的學者建立了個人關係，個人關係有時候有點危險。好像談戀愛，有點危險，可是還是冒著這危險要建立個人關係，我的亞經所的好多朋友同事、前輩跟我說，你太重視個人關係，這個是很危險，如果對方是女的呢？女的，你跟她建立個人關係嗎？有點問題，所以我的好朋友跟我勸告，不要這樣做，可是我認為個人關係不一定是男女關係，比如說做為個人我喜歡你，如果談戀愛，那就做為女的喜歡你，可是不一定需要做為女的，這是很重要的有一個生命，這是一種我的哲學，見學的態度。（很有趣）

我看了板垣與一的著作，對他的研究方法，當時我對他的理解有點模糊，不太明確的，可是還是很同情他的方法的，所以開始採用這樣的方法論，第一次看他的著作是高中三年級的時候，上大學二年級仔細的看板垣與一幾本著作，逐漸理解板垣的方法論。

我1997年開辦現代中國學部的，我昨天跟你說明過了，日本的一般留學生到中國留學的，都是為了學好漢語，學好漢語後馬上回國來，這樣的態度我想培養真正能夠理解中國的台灣的人材來說很不足夠的，所以我想如果一般沒辦法改進這樣的要去中國留學的日本學生這種態度，不能給他們強迫採用留學期間要學更多高等的學術東西，比如說中國留學生來到日本，在大學裡讀書的目的都是為了拿學位的，要學好一個學術性東西，同樣地，我給日本留學生強迫到中國留學要學好拿好學位，學習學術性東西，這是實際上他們不聽我的，並且我沒什麼力量強迫他們。只好在日本國內建立一個現代中國學部的本科生的課程，給他們機會學習中國學術性的東西，就是學好漢語後，把漢語做為一個學習的手段，要學到更高等更高水平的學術性東西，那就這樣首先開辦了現代中國學部，當然需要所有學生學習漢語，一般上大學的一年級到二年級以前要學好漢語，有了漢語能力後，給他們很多機會學更高層的學術性的東西，比如說朗讀中國的文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各方面專業的文本，並且招聘中國的學者來到我們學部，用漢語給學生講專業的課，這樣安排學部的課程，那就這樣招生了

開始的時候，定額十倍多的學生要考我們的學部，所以結果效果很好。但到現在有發生很多問題，這個我不太願意跟你談，還是這樣，有問題的是教員方面，老師方面有問題，我聘請來的日本人的教員，他們的漢語能力有很多問題，有一個問題是教漢語的語言老師，他們教漢語的時候，不用漢語教漢語，用日語教漢

語，這是一個日本語言教育方面老一套的保守的教育方法，我經常跟他們爭論，一定要用漢語給學生教漢語，可是他們不接受，這個奇怪，所以一年級春季學期從八月開始，整個一年級學生把他們派到南開大學，利用四個月的時間集中學漢語，那個時候南開大學的漢語言文化學院的對外漢語教育專門的老師，他們出來給我們學生集中學漢語，都用漢語給他們教漢語，一年級秋季學期他們學到好多東西，回國來二年級春季學期還是教漢語的日本老師用日語教漢語，這我想太愚蠢的方法，所以我跟他們開始爭論，爭論得越來越厲害。另外，還有其他專業的中國近代史的老師，他們的漢語能力相當差，我從中國聘請過來的名氣很高的學者，為了專門給學生講專業課過來的，我們日本老師跟他們能不能溝通呢？不能的，只能跟他們講日常會話，專業方面不能跟他們溝通的，連一秒的話題都不敢談，這樣互相不能溝通的，日本老師是多數派，聘請過來的中國老師只有三位，他們是少數，他們要會議的時候，我自己想要還要從中國大陸聘請中國老師，可是大家都反對，因為他們說這三位老師日語水平太差，我自己當然給他們反駁，你們三十多年一直研究中國問題，怎麼不能用漢語跟他們溝通，比如說你是英國經濟、美國經濟、歐美經濟的專家，聘請過來的美國學者，如果專門研究歐美經濟的教員不能跟他們溝通，那就很奇怪的，你們研究中國問題三十多年、二十多年研究的，還是不能溝通，為了克服這樣的狀況要開辦現代中國學部，可是聘請來的日本老師的漢語能力太差，並且還是居高看下的，自己以為自己是很有權位的，那就沒辦法了，現代中國學部現在的處境發生很多問題了。

2000年差不多九年以前我退了學部長的地位，因為我發病了，要做人工透析了，不能繼續學部長的工作，可是後來習慣了做透析的治療，那就可以擔任一些負擔重的工作，就在這個時候，文部科學省公開召募 COE，科學研究基地的項目，這個項目的研究費相當大的，一年的經費是一億日元，連續五年一共五億，當時的校長找我過來，一定要辦申請，辦申請的時候期限，校長本來更早要提出想法給我，可是他給我提出這個申請問題的時候，申請到來的三個星期以前，只有三個星期的時間，很短，本來要組織一個小組，辦申請的時候這個項目的規模挺大的，本來個人不能申請，一定要組織一個小組，可是時間太不足夠，最後我決定我個人辦申請，用三個星期寫好申請文件，然後辦申請了，就通過了，ICCS 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的理想還是平等公正的展開兩國之間的學術交流，並且中國研究的學術課不僅僅是中日兩國之的研究課題，有全世界的包括歐美的先進國家、東南亞、南亞和中東各個地區都有中國研究的領域，所以我給全世界各個中國學領

域的人士號召到我們研究中心來互相合作，要採用的研究方法就是我的方法，開始的時候他們不那麼容易理解我的想法，可是每年召開三四次的國際會議，經常跟他們溝通，他們開始逐漸理解我的研究方法論，當然也有不同意的，可是還是繼續下去，這樣成立了一種統一搞一個中國學的學術性的圈子，我們現在想今年的11月份要建立一個國際學會，大概名字是國際中國學會，當然包括研究台灣問題，研究台灣的時候用中國學的名稱來搞研究，也有人反對的，因為台灣獨立派一般認為台灣不是中國的，用這個中國學這個名字他們不能接納。（問：台灣的學者嗎？答：也有，台灣學者也參加過的，台灣人）用中國學的名稱適當不適當還要考慮，可是一定要建立一種國際中國學，因為歐美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的，他們的研究方法也跟日本的學者研究方法一樣的，都有類似的毛病，（問：就是以高居下，回：對）並且我跟你說過的就是方法論上，特別學術價值觀有金字塔式的結構，在頂點是美國學術界，第二層是歐洲，第三層是日本、加拿大、澳洲，第四層第三世界。

今天說的有點多，先到此為止。



加加美光行教授訪談 III

時間：2009/5/21

地點：日本名古屋，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研究所

訪談、整理：陳綺齡（台灣大學政治系碩士）、邵軒磊（台灣大學政治系博士後研究員）

問：前一天說到了相互瞭解，目的主體性的問題。請接著談談您研究中，主要的關心對象？

我的研究最關心的是國家與社會，國家跟社會的關係，或者國家跟個人的關係，這一點我最關心的，日本的國家來龍去脈，中國的國家來龍去脈，特別歷史的來源，到今天有什麼特別和障礙。包括中國韓國台灣，亞洲全體也都是對過去日本軍國主義很有關心，我自己作為日本人也對自己國家的軍國主義的歷史來源還有到今天有什麼變化這些問題很有關心，對中國的國家同樣有很大關心，中國的國家跟其他國家包括日本國家在內，其性格很不樣，一般要研究或要分析一個國家，有一個很有效的辦法，是從少數人的視角來看這個國家，minority，這是我採用的一個方法，比如說要理解中國國家，從香港這個中國南方的一個小共同體社會來看中國國家的時候，有什麼樣子、有什麼特別、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理解到，同樣的，從邊境地方，比如說從西藏、新疆或內蒙，這些邊境地方來看中國，中國國家用少數人的視角來看這個樣子是怎樣，有什麼特別都可以比容易理解到的，我首先研究了台灣和香港，同時研究了西藏、新疆和內蒙這些民族地區問題，研究民族問題我的目的不是為了只要研究少數民族自身的問題，研究民族問題的時候，當然需要研究民族自身的問題，可是這是我寫的一種鏡子當中的日本與中國這個話題完全一樣的，用少數民族做為鏡子來看中國，少數民族做為一種鏡子來反映中國的，那中國是什麼樣子比較容易理解，反過來，中國做為鏡子來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有什麼樣子，這個也比較容易理解，中國或少數民族互為鏡子來利用，香港、台灣也是一樣，香港、台灣跟中國互為鏡子，用中國大陸做為鏡子來反映台灣、香港，香港、台灣什麼樣子就比較容易理解到，同樣地，香港、台灣做為鏡子來看、理解中國，中國什麼樣子就比較容易理解到，這是我的方法，所以日中關係也是一樣，互為鏡子來利用。（附合：這樣的話就能了解各式各樣的面向吧）

問：用少數民族來看跟從多數民族漢族來看會有不一樣的中國，那老師會想要用少數民族，是因為大家看到的中國都是漢族的中國，所以老師想要從另外一個方向來看不一樣的中國。

答：對對對。所以，做為鏡子，互相的姿態來看，一個方面來看的話看不到，很多方面來看的話就可以看清，所以民族問題是很重要的。08:00 中國學的方法論也是一樣，為什麼我聘請全世界範圍的所有中國問題的專家，來互相討論我們中國學方法論，我有時候要理解從美國人的視角來看，中國對他們是什麼樣子，這個是我自己要理解的，當然我有一個日本人的視角，從日本人的視角來看中國是什麼樣子，我把握著中國的樣子跟美國人理解到的中國樣子其內容不一樣的，為什麼發生這樣的區別，為什麼發生這樣的多樣性，這就是我最關心的問題，所以聘請全世界範圍的所有中國問題的專家來到我們 ICCS 互相討論，互相交換意見，特別圍繞研究方法論，都是我把美國做為一個鏡子，反過來說，美國人也要把日本做為一個鏡子。

我 1984 年第一次訪問台北的時候，參加一個黨外勢力的會議，那天晚天的會議見到陳永興，台北市議會議員，會上只有他一個人對我很坦率的說為什麼這個人參加，謝長廷和其他人跟他回答，我們願意讓日本人理解了解目前台灣社會的狀況，陳永興跟我說，不需要這樣，我們不需要日本人理解我們台灣，日本人真正理解到台灣的我不相信，並且沒用。陳永興在我面前很直率的說，可是奇怪，我聽他意見後我開始對他有好感，真的。因為其他人都對我客氣，他完全對我不客氣，很直率，他說的是真心的話，所以我很願意跟他做交流，當天晚上最佩服的就是陳永興，並且對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陳永興，他對我來說也是一種鏡子的，我可以把他做為鏡子能夠理解台灣，能夠理解中國，這樣的人也把他做為鏡子來理解中國。跟很多人接觸的話，就會有不同的看事情的角度，我從少數民族問題來研究中國會有不同的進入點，這是很重要的，這就是作為鏡子能互看的。真心的話很重要，不好聽的話也要聽的，什麼都可以做為鏡子的。

問：關於文革的研究，應該不是鏡子吧，但因為文革對中國的影響很多，所以想一直持續做文革研究吧？

我二十四歲左右時年輕開始對文革有關心，對毛澤東很關心，因為我當時日本 1960 年代，日本走過來的路是可以說是歐美式的現代化，可是中國因為不能走這一條路，所以要找自己自力更生的這一條路，這時我因為對自己國家歐美式現

代化的路很有反感，因為公害、藥害和教育、官僚的腐敗，腐敗的很嚴重，農業開始落後起來，有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一起發生，所以我對歐美式現代化很有批評很有反感，那時候把中國做為鏡子要理解日本的，可是後來知道中國的這種否定歐美式現代化的自力更生的這條路也走不通，導致很大的失敗，引起了很大的災難，那時候反過來看，把中國的挫敗作為鏡子來理解日本，那時候雖然要批評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可是我不能全面的否定，所以做為鏡子的時候，鏡子本身有時候有問題的，不是平淡的鏡子，有時候有的凸彎的，鏡子裡面反映出來的日本有時候不是真正的日本，因為如果沒有平坦的，那就反映出來的不是真正的事實。

可是還是要用鏡子，為什麼在鏡子裡面反映出來的有這樣違背事實的情況呢，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課題，所以還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最大的動機是文革時候的中國和同一時代的日本互為鏡子來理解當時日本和中國的。

問：文革時候的中國和當時日本的情況，兩者相對照老師有什麼啟發嗎？（對於日本的走向）

比如說，現在中國特別從改革開放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開始高度經濟發展了，那就還是跟六十年代的日本一樣，導致了官僚腐敗、藥害醫療方面的錯誤和問題、公害、環境汙染，跟六十年代日本完全同一性質的各種社會矛盾都一起發生起來了，這樣的情況我們不得不批評，因為六十年代時候我做為大學生批評當時日本的各種社會矛盾，歐美式的現代化，中國表面上說採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是實際的政策還是採用歐美式的現代化模式，所以導致現在有了很多的問題，這個很像六十年代的日本，可是當然六十年代的日本跟現在的中國有很多不一樣，特別不一樣的是生產力的水平，現在的中國跟六十年代日本不會相比，現在的中國的生產力高得多，高科技的水平高得多了，並且還有跨國的全球化的情況也跟六十年代的日本完全不一樣。

有這樣新的條件產生出來，在這個條件之下，中國追逐還是基本性的歐美式的現代化模式，導致了很多悲慘的後果，可是日本現在還是對自己走過來的現代化的過程沒有徹底的反省，也有很多很多的問題的，日本跟中國可以把他們互為鏡子，才可以理解目前我們東亞特別以中國和日本為主的中心國家的東亞世界的情况和狀況，這是我的方法的。

毛澤東全面的否定「三自一包」，「三自一包」跟現在中國採用的改革政策內

容很相似的，那時候毛澤東說如果中國的共產黨領導當時所說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要展開「三自一包」，如果這樣做下去，那就一定導致資本主義復辟，回到原來腐敗的資本主義，毛澤東這樣說，那這個說法到今天來看，還是有很多說對了，可以說是中了要害，我們日本在戰後不僅僅從戰後，而且從明治維新以後，到今天走過來的現代化的路徑這一條路，到今天我們一定還要反思，反思的時候有時候參考中國走過來的路，中國走過來的路跟日本走過來的路，有時候我們追逐的路線是完全相反，還是都有問題，所以我說在中國的現代化這個課題來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有改革開放，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那現在的改革也不會有，我的想法是這樣，可是現在中國追逐的改革開放也有很多用文化大革命做為鏡子來反省的需要。有點複雜，就是如果只有一面鏡子，那就問題很簡單，可是我們要用的鏡子不是只有一面，是多面的鏡子都要用，（附合：每個東西都可以是鏡子）並且每一面鏡子不一定是平坦的，有點歪曲，所以我們用鏡子的時候，這個鏡子是不是平坦的，有沒有歪曲的，這應該注意的。

問：老師的歷史中的文化大革命的這本書我看了，老師最初是傾向中國民主化市場體制的，但與李延明談話後，老師的想法是不是改變了呢？（33:30）

沒有改變。（問：那麼，中國要往民主化的道路前進嗎？）

李延明 1998 年我跟他做過一次對談，我們的話題是圍繞著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當然是一種民主主義的制度，有什麼民主主義，朝鮮爆發的時候，毛澤東自己下了決心，不要採納新民主主義，時間過早還是要採用社會主義這條路，所以 1952 年他發表了社會主義總路線（編按：應為 1958 年？）。

這是因為如果採用新民主主義，就一定需要對外開放的條件，但當時沒有可能這個條件，還有他不相信蘇聯史達林，還有當然跟美國不得不敵對，所以只好特別到 1955 年，他最後下了一個決定，中國只好採納自力更生的，可是自力更生這條路還是同時要追逐共產黨的理想，因為如果追求自力更生，那怎樣提高生產力，如果不能提高生產力，那採納自力更生也不可能跟美蘇兩大超大國對抗、抵抗，所以一定要提高生產力，可是沒有現代化的機器化的條件，他相信人的力量，人的主觀力量，所以號召人民公社，高度的集體化，就能夠產生人的能力的最高潛在能力，就是當輕視物質方面生產力的條件，它強調的是人的精神力量，不是物質的力量，所以導致失敗了。這個道理李延明當然知道的，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從 1962 年才採納三字一包、市場經濟最大的原因，因為他們也能理解到，因為

毛澤東過度地輕視物質的生產力，所以導致失敗，毛澤東片面地過度地重視人的精神力量，所以要否定這樣的方向，這樣他們採納的調整政策就是為了提高物質性的生產力，這方面劉少奇和鄧小平採用的三自一包、調整政策也有一定的道理的。

可是如果完全方向是一種資本主義化的方向，如果最高領導劉少奇、鄧小平，文盲的百姓不公開說這是一個採用資本主義化的方向，而且還勉強的說這條路是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就是很大的錯誤，這就李延明說的，因為這樣後來九十年代的情況，李延明 97 還 96 年春天他發表萬言書，中國九十年代後半期的情況開始高度資本主義化，所以發生了很嚴重的貪汙腐敗、公害、工廠工人的勞動條件惡化，各種各樣的問題發生了，還是當時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國領導說這是社會主義初期階段，李延明說這樣的說法是要文盲百姓的說法，並且這樣做下去，共產黨人失去自己的理想，本來共產黨的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目標，可是文盲這樣事實中國追逐的是百分之百的資本主義，還硬要說這是社會主義的初期階段，這是文盲事實、文盲百姓、文盲共產黨員，所以共產黨員容易損失社會主義的理想，損失理想的政黨一定會腐敗，這就是李延明要寫萬言書的最大的動機，我理解這樣的觀點，可是蘇聯的戈巴契夫在八十年代後半期到九十年代初，他進行的政治改革，當時大家都想其目標是要實行社會主義民主，不是為了實現資本主義民主，可是 1991 年底蘇聯社會主義最後瓦解以後，在俄羅斯實現的是資本主義民主，不是社會主義民主，中國 1989 在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候，有我的朋友白南風，他們追逐的在我看來也是一種社會主義民主，天安門事件失敗後，經過九十年代進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目前走的路是資本主義，並且民主化這個課題好像不見了，所以我為什麼跟李延明做對談，社會主義能不能追逐自己的民主化呢？社會主義本身一點不可能實現民主化呢？這個問題還沒有正當的回答，有很多人對社會主義失望，我也是對社會主義有一定的失望，因為現在所有的社會主義都沒有實現民主化的，(附合：都是獨裁)，可是資本主義的民主化也有很多問題的，真的很有問題。

資本主義民主化也可以說自由主義民主化吧，在人類歷史上發生了很嚴重的 paradox 悖論，法國革命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提倡自由、平等、博愛，特別自由、平等是民主的，這是 1789 的事，還有 1776 美國獨立，美國獨立公布的獨立宣言也是在人類歷史上很有名的人權宣言，也可以說是民主化的理想，可是到了 19 世紀列強國家侵略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把他們變成自己的殖民地，隨便剝奪他們

人權，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美國 1776 年獨立時，雖然公布了很有名的人權宣言，可是在北美大陸還是有大量的黑人做為奴隸，被白種人忽視他們的人權，到了 1866 年美國總統林肯發表解放黑人奴隸的命令後，黑人才能有公民權，黑人在 1866 年獲得公民權，到 1968 年黑人公民權運動還要奮鬥，最後到達真正的公民權，所以雖然 1866 年林肯公布解放黑人奴隸命令，雖然實際上解放黑人奴隸，可是黑人不能獲得真正的公民權，只能拿到形式上的權利，所以 1776 年美國獨立，發布了獨立宣言做為很有名的人權宣言，到 1968 年差不多兩百年期間，黑人被白種人很殘酷的剝削人權，那這個人權宣言是什麼東西呢？就是這樣資本主義民主自己有很多悖論，為什麼發生這種悖論呢？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研究的課題。

目前社會主義民主沒有實現，資本主義民主就沒有問題嗎？我不相信這樣。
(55:32)

李延明跟我說過，大家都說李延明是黨內左派，可是自己以為自己是民主派，因為他嚴厲的批評黨內腐敗，有這樣很嚴重的黨內腐敗所以不能實現民主化，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一個好例子，發生天安門事件是 1989 年 4 月中開始活躍起來的民主運動，學生提出官僚腐敗問題，並且北大的、北師大的他們學生領導都說黨的腐敗在黨中央特別最高領導階層是最嚴重的，這樣點名的批評李鵬和其他領導，太子黨，李鵬的兒子和鄧小平的兒子，有很多最高領導的兒子都有腐敗，並且民主派的師生都點名批評他們的，大量的百姓開始支持他們了。因為民主跟社會矛盾是離不開的，如果只要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報導自由，那老百姓對這種民主化運動沒有多少關心的，1980 年代中半期，安徽某大學的副校長，他號召民主化運動只要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報導自由這一些，所謂資產階級的人權，那老百姓的反應沒那麼強，可是到了 1989 年北大、北師大的他們號召民主化，同時提出官僚問題、黨的腐敗問題，社會的反應很強大的，百萬以上的公民都參加遊行，鄧小平很害怕了。民主化跟腐敗現象還有其他公害的、藥害的、醫療方面的過失這種現象是離不開的一種互作互動的關係，現在共產黨很多黨員損失了自己的理想，產生出來一種信念危機的一種場面，黨員有信念危機，那就一般百姓也有信念危機，上有信念危機，那就下也有信念危機，那就整個社會都有信念危機。那怎麼能夠實現民主化呢？所以我同情李延明的，贊成李延明的一些觀點，我跟他不一樣的地方是，他過度的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我不太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如果要追逐社會主義，就要追逐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根本的理想是要保護社會的弱者，弱者的意思比如說殘籍人、老人、病人、懷孕的婦女，這些弱者應該

受到社會的保護，婦女問題，公害問題發生時受到最大損害的被害人也是弱者，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就是要保護社會上的弱者，這是社會主義的理想，如果損失這樣的社會主義，那我們實現的不富有社會是什麼社會呢？我想貧富差距拉大，弱者越來越受到損害，這樣的社會我不能接受，我自己是殘疾人（每週三次要做透析）。如果社會主義是這個意思那就我相信這個社會主義。

我最尊敬的比我大二十多歲已經去世了的一個哲學家日本人朋友，1989年六四運動發生的六月底去世了，他是市井三郎。¹¹他七十年發表一本書，「歷史進步是什麼」。¹²他在那本書裡面提到一種「不條理的苦痛」，是什麼意思呢？不條理的意思是有人受到很大的苦痛，受到苦痛的原因完全不在他自己本身，自己一點沒有雜症、一點沒有什麼錯，還是受到很大的苦痛，這樣的苦痛就是不條理的苦痛，比如說生在巴勒斯坦的一個嬰兒，他在巴勒斯坦出生這個事實對他沒有什麼雜症，可是他因為出生在巴勒斯坦，他家受到空軍的轟炸，他自己的父母、哥哥姊姊都死亡了，他變成一個孤兒了，這種孤兒淒苦的苦痛要他來負責嗎？市井說一點沒責任還是受到很大的苦痛，人類應該替他解決這種苦痛，才能算是進步，他說生產力提高的不算什麼進步，人類歷史的進步就是要解決這種無條理的苦痛，比如說你出生做為女性，受到壓迫和差別，那受到差別的苦痛也算是一種不條理的苦痛，所以市井三郎提出的這個理論我完全百分之百的同意，完全支持他的，我的思想也受到市井的影響，實際上中國社會裡面有好多這種不條理的苦痛，所以產生了很多社會弱者。實現平等的理想跟這種理想有點不一樣，不一定要有全面的平等，雖然沒有平等，可是一個社會應該保護社會上的弱者，我跟李延明有共同地方是這個地方，他說共產黨員都喪失了理想，有信念危機，不得不產生一種很嚴重的腐敗，有了腐敗還是同時產生大量的社會弱者，沒有給他們保護。

¹¹ 市井三郎（いちいさぶろう、1922年6月18日 - 1989年6月28日），出身於大阪府。畢業於大阪大學理學院，在曼徹斯特大學、倫敦大學大學院哲學院進修。戰後，加入鶴見俊輔所開的「思想之科學研究會」，編輯並撰稿於『思想の科学』期刊。1970年代，與鶴見和子、山田慶兒、桜井徳太郎等，組成「思想的冒險」俱樂部。1980年代，與山口一郎、加々美光行、山本恒人等人，組成「文化大革命」研究小組。曾任1954年愛知教育大學助教授，1961年以後為成蹊大學教授。專門為分析哲學、社會思想。

¹² 市井三郎著，《歷史の進歩とはなにか》，（東京，岩波書店，1971）